

從中國人的學習文化和心理看香港 高等教育國際化

孫天倫

香港樹仁大學

摘要

教育乃一種包含使命感的文化傳承過程，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孕育了中國人獨有而且優秀的教育理念和學習文化。近年各地積極探討高等教育國際化，為此，本文嘗試從中國人的學習文化和心理關聯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

關鍵詞

香港高等教育，教育國際化，中國人學習，學習心理

序言

近年各地積極探討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各種有效的發展策略，務求令高等教育界達致卓越，以提高整體的國際競爭力。從經濟角度看，將教育當成一種可銷售的服務行業似乎是理所當然。但作為一位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我會視教育為一種包含使命感的文化傳承過程，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永久延續人類文明和創造福祉的基石。因此，我嘗試從中國人的學習文化和心理關聯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

中國人的教與育

中國人的教育包含了兩個層次。許慎在《說文解字》謂：「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互古至今以儒家之道德倫理作為社會制度骨幹的中國人社會裡，「教」是從上而下的灌輸，簡單來說就是輩份高的人怎麼做，輩份低的人就跟著幹。「教」是第一層次，人們通過施教和仿效將知識技巧、思想理念、規矩習慣世代代傳承下去。「育」比「教」的層次更深。「育」是培養後代令他們達到至善境界。儘管這種個人完美的境界遙不可及，家長和老師仍然有責任鞭策子女和學生成才，使他們擁有完美德性。「教」傳播了人類的知識和文化，「育」則令人領悟人性，縱然在千變萬化的環境中都能時刻保存人類的真善美。

早於春秋時代（前 711 – 476），秦朝最先定下「士農工商」的概念，將社會階級劃分，並以「士」（學者）為首。士子被視為社會上擁有豐富道德知識的人，受教育的程度最高。這種根據道德教育程度分成等級的社會制度，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自我觀、學習觀念和動機——只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士子能夠並且必需擔當社會的重要角色。從漢代起（約公元前 206 至公元 200）至接近清代末年（1905），中國一直沿用舉薦制度來選拔官吏。隋代所創立的科舉更主導了中國近千多年的選秀模式。科舉建立在「為才是舉」的概念上，以智慧、資歷和品格作為選秀標準，提拔優秀的民間人才，並消除了先秦分封世襲的門閥限制。人民可以自由報考統一的公開考試，從此教育便成為了人民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階梯，並為中國社會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模式奠定了基礎。

家庭與教育

一、家長教養心態

長久以來，中國的家長是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一方面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職，所謂「養不教，父之過」。教育是為了向子女傳承家族和社會正確的價值觀，確保他們不會做出「愧對祖宗，枉為人」的事。養而不教就是父母的過失，有損父母應當的理想形象；另一方面父母打從心底是很希望子女能夠求學成才。中國名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恰好反映中國人相信良好教育固有之價值，並且對學習和學術成就的重視。若果子女金榜高中，必能為子女本身、為父母、為整個家族帶來

榮譽和可以預期的幸福將來。所以，管教子女是父母應盡的教育義務，也是提高家族社會地位的途徑。中國的家長在子女學習上擔當很重要的角色，既是道德模範，亦是權威的學習督導員。

所以，中國父母認為自己是為孩子訂下和執行操守準則的權威，這乃是父母社會化的專責，為促成子女的成就要高度投入，愛護和關注。尤其是母親，既要慈祥（仁慈、富同情心和和藹），也要嚴格（嚴肅、嚴厲和管教有序）。只是慈祥並不足夠，並會被責為「慈母多敗兒」（仁慈的母親多教養了沒出色的孩兒）。所以 Chao, Dong 和 Zhou（1997）認為中國父母有相當高的教養觀念。Chao（1994）將「教訓」（去教和訓練）加進中國父母的管教模式，「教訓」是父母透過監管、經常提點和示範來協助子女積極適應合群和道德生活。這種管教模式與 Baumrind（1967 & 1971）形容的嚴愛型（authoritative）父母較為接近。嚴愛型父母對孩子多要求，多關愛，亦較關注孩子的需要和能力。他們傾向對孩子有合理和合適的期望，經常以溫情、關愛、誘導和鼓勵方法管教孩子，這與孩子建立信心和積極生活取向而所產生的強烈上進心和優秀學業表現有正面關聯。

二、子女學習動機

作為子女，從小就在父母的潛移默化中，認定學習和獲取學術成就是回饋父母的一種直接方法，是一種「孝」的表現。事實上，中國的孩子很明白父母對他們學業的極高期望。清朝康熙年間著名教育家李毓秀所著的《弟子規》，內容採用了《論語》「學而篇」裡的文義，列述了學童們在生活、待人處事和學習方面的規範。其開首為：「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從先秦至清代二千五百年間，「百行以孝為先」的概念植根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孝」在中國社會是基本也是崇高的道德觀念，是中國人建構其個人、家庭和社會價值觀的基石。另外，學習，除了是回饋父母的養育之恩，也是爭取個人成功和家族榮耀的一種手段。因為只有通過學習和考取功名，出生下等階層的平民才能有機會突圍而出，脫離卑賤和貧窮的生活。

中國人的學習行為與心理關聯

人通過各種感官接觸外間事物，透過大腦的思考，伴隨情感的體驗，以行為反映對事物的認知和感覺。根據行為心理學家的觀點，人在受到外在環境刺激時會作

出相對的行為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包括影像、聲音、感覺等都會被記下來。當過程不斷重複，人逐漸了解環境刺激與行為的關係，每次汲取的信息都會累積成「學習經驗」。這種經驗就是人藉著學習從而影響行為的心理基礎。從心理角度看，人是因為需求而學習，Maslow（1943）為人類的需要分了層次，最基本的是基本生理和安全需要，然後有愛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還有自我成就和超越靈性的需要。所以人類的學習不僅是為了生存，還要滿足精神層面的需要。此外，人類是群居動物，學習亦不單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人是會為群體社會的福祉而學習。

中國人認為學習是：學屬知，習屬行。學是指知識和經驗的累積，習是指知識和經驗的實踐。學習的最高境界乃是「知行合一，達到至善」。在這裡，「知行合一」的知，並非表面所謂的知識，實質是良知的意思。雖然孔子也強調「格物致知」（即探究事物原理，而從中獲得智慧），可是良知的學習往往凌駕於事物原理的學習之上，中國人的核心學習乃道德規範而非生活知識。

一、學習心態

長年累月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洗禮，以及傳統社會意識（特別是階級制度）的薰陶，中國人「自抹消我」的一種尊重和謙卑的觀念很重（Li, 2003; Sun, 2012）。君子要抱有虛心的學習態度，才能達到道德的至善境界。上文提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這是單向的灌輸，並不存在互動的作用。中國人對權威抱有盲目而不加批判的絕對尊重，並將這種尊卑的心態伸延到課堂學習中，這大概是受孔子重道德，講孝道的思想影響。中國俗語有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師既是知識技術的專家，是道德行為的楷模，也是地位與父輩相當的一個權威人物，所以一般中國人普遍認為批評和挑戰老師是不尊敬的，而且學生多願意接受老師對他們嚴苛和責罰（Woodrow & Sham, 2001）。

學習時心要謙卑，行要謹慎。中國人著重規則和操守，默默在旁觀察學習是中國社會一種待人處事的規矩，亦是成熟和明白事理的表現。故此，中國人的課堂，一般都被認為是單向，被動。學生會避免於課堂上提出批評的問題，也甚少主動回答問題。一來是要尊師重道，不能令老師蒙羞，二來是怕問錯和答錯而丟臉（Sun, 2012）。臉在中國社會是社羣對一個人品質的信任。若一個人做了丟臉的事，就是做了這個社羣不容許和不被接納的行為。這表明了此人修養不足，亦很自然歸咎於

父母的疏忽管教。丟臉的人的社會地位很低，甚至備受鄙視。於是學生上課的態度都較為約束和內斂，避免破壞課堂上的和諧氣氛。中國人的學習講求「聽話」，並不鼓勵自我表達和言語溝通。這種心態是結合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學習心理而建構。Bandura (1977) 所提出的社會學習論，認為學習是社會環境、個人對環境的認知和個人行為三種因素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通過觀察和模仿，人學習如何為家庭及社會所接受，是種社會性的學習。人從行為後果帶來的懲罰或獎賞而正面或負面強化行為表現。這正正是剛才提到「臉」（面子）的功能。

二、務實保守主義

由於考試制度給予人民向上流動的機會，滿足人民求勝的心理需要，受中國奉行的考試文化所影響，中國人傾向背誦、規劃和有序的重複，亦偏愛緩慢、循序漸進而準確的方法，喜歡詳盡的大綱和列點而不喜歡假設和推敲 (Sun, 2012)。學習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關乎個人與家族榮辱，所以必須務實、保守、有效和實際。雖然這種務實思想的確是達到獲取和保留知識的學習目標，但就被質疑窒礙了中國學習者的反省認知能力，包括：獨立批判思考、自省、建立理性思考和證據為本的連貫論點、應用知識解決困難和將學術的學習聯繫到每天的生活 (Ho, Peng, & Chan, 2001; Sun, 2012)。在集體文化的影響下，人們甚少在穩定和安逸中追求適應性的衝擊，更不會在集體以外尋求創新的轉變 (Kim, 2009)。中國學生亦普遍以將來的職業取向來選科。他們相信學業成就可以帶來一份好工作，可以實踐個人志向和家族期望，可以贏取聲譽和顏面。

三、焦慮和抑鬱

Yee (1989) 曾經就中國學生的焦慮問題進行跨國研究。研究發現超過一半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出現嚴重焦慮。他們的焦慮成因來自四個方面：學業成績壓力、沉重的功課量、不適應英語學習和缺乏社交關聯。而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生亦相較美國的學生存在更高的焦慮感。中國人因學習問題而導致焦慮和抑鬱實在是相當普遍。中國社會亦甚為輕視心理和情緒問題，原因有二：第一，集體文化下，個人福祉經常被蔑視；第二，表達負面情感會破壞社會和諧，並不容許 (Sun, 2012)。中國教育制度以通過考試競爭為主，而且一個人的教育往往包含了很多人的努力與犧牲，學生自然承擔著很多人的責任和期望。學習

就是責任，本身已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並不輕鬆。在熾熱的考試文化下，學習就是考試，那麼考試分數就是量度學生有否履行責任的一把尺。這個把學習、考試與責任並提而引起恐懼的心理關連，是種制約心理反應（Conditioning response）。學生一想起考試，就會害怕失敗，亦會為失敗而感到內疚。失敗的學生很可能受到父母和老師的責備或同儕的漠視，感到巨大壓力和自尊受損。學生會容易表現較負面的身心行為以逃避學習和考試，輕度的困擾包括失眠、食慾不振、社交障礙、自卑等。嚴重的情況會令學生失去希望和變得憤世嫉俗（Smith, 1997）。因學業問題導致的自殺個案在中國社會亦屢見不鮮。

香港學生學習現況

一、中小學階段

儘管香港是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大都會，香港人種種的心理和行為，無不有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烙印」。香港學生與家長在學習上的心理表現都反映了中國人的傳統特質，例如內斂、嚴肅。而在學習行為上一般都趨向保守、被動。在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前，我先從香港中小學生的課堂行為透視他們普遍的學習心理。中小學課堂特別注重秩序和守規矩。學生井言有序地，坐在已被安排的座位上，老師進入課室後同學們站立鞠躬，坐下後安靜上課。課程安排亦非常緊湊，整個學年都充斥著評估和考試，學習的內容是主要圍繞考試為主。課外補習風氣盛行，一個2011/12年度的調查以問卷訪問16間中學共1,720名學生，發現54%中三學生有補習，就讀中六的文憑試考生，比例更高達72%（Bray & Kwo, 2014）。促成補習風氣的主因，是一般家長和學生都認為補習有助考上著名中學，再攀上重點大學，這種可帶來巨大回報的投資是值得。雖然許多父母都不曾讀過關於教育投資回報率的實證研究（Kara, 2010），但會有「長期接受優質教育的人就會有越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強烈印象。家長和老師總是擔心在學校表現不好及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怕他們將來升學和就業的路崎嶇難行（Bray & Lykins, 2012）。因此出現很多所謂的「直昇機父母」、「怪獸家長」，他們過度溺愛和保護子女，事事代勞，使子女養成依賴性格，失去自主學習的動力。香港教育學院（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於2014年曾探討香港華人學生的學習動機。調查表明了約20%中學生用功讀書是為了報答父母，近7%欲貢獻社會，約40%希望能找到人工高職位好的工作，以照顧父母。

這些行為現象，正正反映香港學生循規蹈矩、力求上進，其動機與中華文化有深切關係。

二、大學階段

香港奉行精英教育主義，校內和中學公開考試成績好，獲大學取錄的機會自然高，在科目上的選擇亦多。可惜，大部分學生都會先看學校排名、校園設施、就業前景等外在因素，而甚少從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等內在因素去考慮選讀哪間學校和科目。現時香港的大學科目，以醫科、法律、工商管理最難考入，成為尖子所謂的「神科」。據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之收生公佈結果，2017 年文憑試六名考獲最高成績的「狀元」，全數入讀了兩院校的醫科課程。這種爭讀某些專業科目的現象一直相當普遍。本地報章《香港 01》曾統計，由 2011/12 至 2015/16 年的 42 名狀元中，約 55% 讀醫、約 24% 讀法律。事實上純理科和純文科一向不是學生的首選，近日亦有大學因報讀人數少而取消數理主修科的問題惹起爭議（林炳坤、鄧穎琳，2017）。這些情況反映了學生的學習取向側重專業和實用性，院校亦會因資源問題在平衡學術和經營上需要作出取捨或妥協。在這種氛圍下，學生被社會規則所限的保守心態驅使下，的確忽略了自身真正的興趣和學習需要。

傳統學習心態對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的影響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其 2010 年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內提到香港「需要一個多元化、資源充足和富創意的專上教育界」。委員會亦闡述高等教育的功能是：傳授技能、培養創意及推動創新；令大學生放眼世界，並建立正確道德觀和行為守則。而大學生的學習經歷，應着重鞏固個人及社會責任感。香港政府自九七回歸前後已積極推行香港國際教育的改革，尤其推進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各所高等院校紛紛投放龐大資源發展科研、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聘請海外著名學者、錄取國內外優秀學生、引入高端學習科技、增加課程國際元素等，務求提升國際排名，積極與外界建立關係，加強及維持院校的全球競爭力。

雖然政府強調推動院校國際化並不表示院校會忽略傳統價值觀念和本地需要，但從上述現今的香港學生學習現況，似乎實際與理想還是有段距離。

一、側重工作前景，忽略興趣培養

學生選擇修讀有前途的學科本不是壞事，但只懷著畢業後找到好工作的心態而沒有評估自身對學科的興趣和性向，這個情況並不利創意和創新的推動。從教資會網站供搜尋的資料顯示，2015/16 年八大共有 1,178 名大學生終止學業，比較 2009/10 年增了多達 76%。雖然退學人數急升的主要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從上述學生普遍選科的心態來看，相信是興趣與學科錯配，導致學生失去繼續學習的動力，繼而影響學習表現和成績。若果成績差又未能轉科，學生往往要退學另覓出路。就算學生選擇堅持完成課程，整個學習過程可能充滿困難和焦慮，降低學習的自我效能和信心。事實上，興趣是自主學習及創新研究的先決條件，好奇心是持久學習的動機。單靠加強國際化的大學教育資源根本解決不了學生缺乏動力去提升學習的問題，而且在大學才處理問題亦已經太遲。此外，上述提到學生的學習取向實際，所以一些較受歡迎的學科都是技術科目而非學術科目，技術科目所包含的研究部分在一般學士程度的課程也較少，這無疑是窒礙發展本地學生對學術繼續研究的興趣。據教育局於 2014 年的資料，在受資助的八大院校就讀碩士及博士課程的 2,000 多名學生中，佔近七成是內地學生，共 1,600 多人，人數比本港學生多兩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佈，2014）。雖然高等教育國際化理應吸納不同地方的優秀人才，但這個數據確實反映了廿年來高教界所致力推動的國際化未有好好培養本地學生對學科研究的興趣，這是整個界別需要重新審視的地方。

二、自我要求過高，增加學習壓力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於 2016 年曾進行一項大學生普遍的學業壓力來源和壓力指數調查，結果顯示，九成二（332 人）大學生承認對學業感到壓力，以 10 分為滿分，當中近六成評價學業壓力指數為 7 或 8 分，平均分為 6.86 分（大學線，2016）。由於配合教育國際化、加上近年大專院校提倡全人教育，故為學生提供許多課外的社會體驗活動、學術交流的機會。學生近乎疲於奔命地申請不同獎學金、參加各項學生活動，但同時也要兼顧學業成績。大學比中學的評核方法複雜，功課量也相當繁重，例如做課堂匯報、寫論文報告、測驗考試，令學生吃不消。相比中學井然有序的學習生活，對於自主性高而且繁忙的大學生活，學生要有更佳的時間管理和處理壓力的方法。可惜很多學生都未能好好掌管時間的運用，有時會因為課

外活動太忙而蹺課，因而影響學業成績，造成更多壓力。大學生的情緒問題日益嚴重，自殺個案增加，反映學生面對大學「放眼世界、擴闊視野」的學習生活甚為不知所措。

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出路

隨著社會發展，現代學習環境比古代優越很多。古人攀山涉水才可以上學，現代人按一下鍵盤就能知天下事。古今的學習內容和方式也很不同，古人所學的禮、樂、射、御、書、數也未必符合現代性。那麼為何還要從先秦時代談起中國人的教育呢？這是因為社會文化、思想、理念的發展是源遠流長，中國人的學習心理早由二千年前諸子百家學術思想大開放的時期即已孕育萌芽，縱然廿一世紀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學習，只要是在中國人的家庭中長大，那種保守、被動、實際的學習心理依然存在。中國父母重視子女學業的教養心態、子女回饋父母的務實學習動機、以考試作為選拔人才的客觀標準，在中國社會都是很合理不過的概念。我們並不要推翻中國人的教育文化以西方那套哲學理念取而代之，因為每種社會文化都是值得尊重，但對於歪曲了的教養心態和學習風氣必須加以修正，才能讓我們的教育邁向真正的發展。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不能空談內容、形式和方法，而是需要適合本土價值觀和心理需要。若沒有解決本地學生根本的學習問題，香港再有更高的國際排名也是枉然。

從現代教育角度看，大學是培育具世界觀的未來領袖之搖籃。而整個高等教育界所推動之學生為本、全人教育、多元發展、終身學習，都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基本教育方向。政府需要在基礎教育開始全人和多元思維訓練。若要推動創新和科研的發展，可從跨學科的知識訓練做起。跨學科訓練令學生甚至老師涉獵不同範疇的科目，從而促進科目之間的聯想，激發新的思維和興趣，並大大擴闊學習和研究的國際視野。跨學科訓練不限於純理論的科學研究，還可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應用研究，實證研究等。

作為一個多元化的經濟體系，所有行業和科目都是各具社會和經濟功能。但在精英教育主義和考試文化下，某些專業和行業被受吹捧。香港若要有全面的發展與世界接軌，則要提升其他被忽略行業和科目的地位。事實上，政府已重新推廣應用

技能（例如建造業、服務業等）職業的重要性。另外，對一些文化保存和人文發展的科目，政府和高等教育界都需要給予多點支持和肯定。當香港社會認同不同科目和行業的貢獻，學生自然在大學有更多的學科選擇，從而有更強的學習動力與滿足感，減少「為過關而考試，為考試而學習」的那份壓力感。畢業後學生亦能夠容易尋找適合自己職業取向的工作，在自己有興趣的行業發揮所長，爭取個人榮譽以回饋父母。這樣更配合學生務實主義的心理，亦促進了香港人力市場的發展。

大學學生受壓力和情緒困擾都是高等教育界必須要正視的問題，這些負面心理表現除了影響個人健康，若然沒有妥善處理還會釀成風氣，影響整個社會。雖然在大學學生已可自主地學習和生活，但一般大學生還是十七、八歲的青少年，還未離開青春期。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們獨立意向強，想擺脫父母的約束，情緒多變，喜歡與異性交往，社會經驗不足。因此，他們特別需要正確的指導，並且需要時間適應截然不同的大學生活。很多學生以為參加許多活動有利他們將來的就業，但過多的學習和課外活動只會令他們更頭昏腦脹，莫說要如何去開拓個人潛能。我認為大學可為學生設計學習形式輕鬆，考核內容簡單的核心或必修通識科，特別教授個人成長，生涯規劃、情緒管理，時間管理和道德培養的課題。這既可以在有限的四年大學時間深化學生個人和社會應有的價值觀，也可為學生融入大學生活提供適切指導。

總結

香港高等教育要成功邁向國際化需要宏觀和長遠的計劃藍圖，除了有發展經濟的考慮，還要配合社會文化和學習者心理的特質，才能真正做到屬於本土的全人教育，建立屬於香港的絕對優勢。此外，我們亦需要正視現在香港學生面對的學習問題，反思如何求同存異，在西方新思維的啟蒙下，同時能夠保存中國優秀的學習和教育心理特質，培養良好學習態度和正確教育觀。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根和魂是保持社會質素和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因為社會和諧一向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有賴政府的推動，致力給予良好的教育環境，為孩子打好健康的心理基礎，讓他們更勇敢面向世界，接受挑戰。

參考文獻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0)。〈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2017 年 7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602-1-c.pdf>
- 大學線 (2016)。〈學業壓力大 大學生三成半抑鬱〉。2017 年 7 月 28 日，取自 http://ubeat.com.cuhk.edu.hk/126_studentstress/
- 林炳坤、鄧穎琳 (2017, 7 月 28 日)。〈DSE 放榜 2017：3 男 3 女 6 狀元誕生邊間名校出最多狀元？〉。《香港 01》，取自 <https://www.hk01.com/港聞/103771/>
- 香港教育學院 (2014)。〈教院動態：社會期望造就學有所成？〉。2017 年 7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hkiednews.edu.hk/en/content/index.do?contentCode=1397183682730&lang=tc>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佈 (2014)。〈立法會十三題：錄取本地及非本地學生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2017 年 8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5/14/P201405140431.htm>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umrind, D. (1967).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 76, 43–88.
-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 4, 1-103.
- Bray, M., & Lykins, C. (2012). Shadow educatio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in Asia (No. 9).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Bray, Mark & Kwo, Ora (2014).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or Public Good: Policy Options for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Asia*.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93 pp.
- Chao, R.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 Chen, X., Dong, Q., & Zhou, H. (1997). Authoritative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social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1(4), 855–873.

- Ho, D.Y., Peng, S. & Chan, S.F. (2001). Authority and learning in Confucian heritage education: A relational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In C.Y. Chiu, F. Salili & Y.Y. Hong. (Eds.). *Multiple Competencies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9-47. Connecticu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 Kara, Orhan. 2010. "Comparing Two Approaches to the Rate of Return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Education Economics*, 18(2), 153-165.
- Kim, K.H. (2009). Cultural influence on creati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n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creativity among Korean educator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3(2), 73-93.
- Li, J. (2003). The core of Confucian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February 2003, 146-147.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
- Smith, D. (1997). *Middle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The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Sun, C. T. L. (2012). *Themes in Chinese psychology*. Cengage Learning Asia.
- Woodrow, D. & Sham, S. (2001). Chinese pupils and their learning preferences. *Rac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4(4), 378-393.
- Yee, A.H. (1989).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Psychological effects upon Asian student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0(3), 213-232.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 From th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learning

SUN Tien-lun, Catherin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bstract

Education as a process that embraces a miss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during which Chinese people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unique but superior educational values and learning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n active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learning.

Keywords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learning, psychology of learning